

# 喇嘛洞铁器整理随笔四则

万 欣

## 1. 墓葬铁器的“民族性”刍议

喇嘛洞墓地是国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以三燕文化墓葬为主的墓地，年代为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sup>[1]</sup>。该墓地出土铁器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随葬之普遍均为目前国内仅见。就目前所知，在东北地区可与之并列提及者，只有位于辽北地区丘陵地带的西岔沟墓地（西汉武帝至昭帝初期，约当前140年至前80年）和位于吉林北部松嫩平原的老河深墓地中层墓葬（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约当前1世纪后期至1世纪初）<sup>[2]</sup>。从已发表的有关这两处墓地的铁器资料来看，它们均属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与地域性、民族性因素共存的铁器文化。在相对年代上，喇嘛洞墓地与前两者之间存在着三四百年的时隔。在铁器文化面貌上，同前两者相比较，喇嘛洞墓地铁器群表现出了在汉文化因素进一步增多的同时，其地域性和民族性因素更加明显的特点，亦即在铍、铲等农具和斧、镑等手工工具这些汉式生产工具大量出现的同时，以鞍桥包片和马冑、人冑为代表的铁制马具和防护装备系统也同期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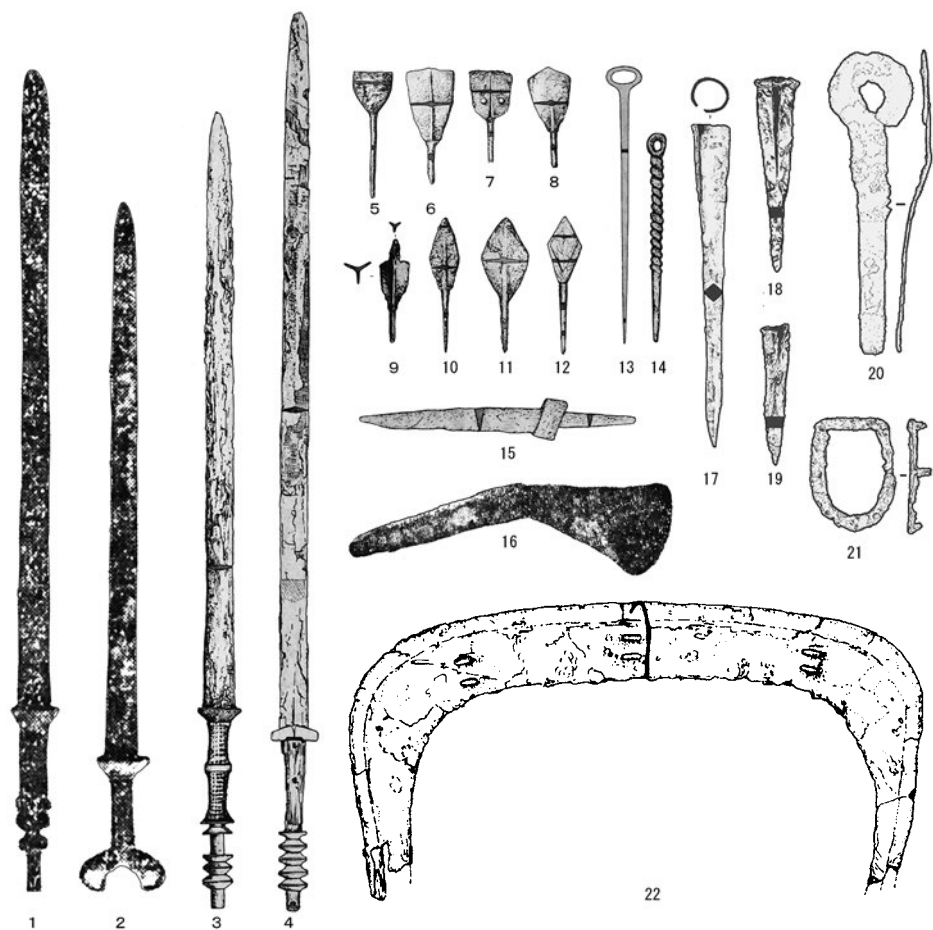
综观这三处墓地出土的铁器，其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主要表现在：

在铁工具类中，环首小刀和锥类均占相当比重，其中西岔沟墓地出土铁工具250余件，老河深墓地出土小刀97件、锥65件。这类小型工具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显然应与肉食加工和各种皮装、皮具的制作有关，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特点。喇嘛洞墓地出土的包括这种小刀在内的削类近250件，虽几乎不见有锥，却新出现一种渔猎工具——冰镞。此外，西岔沟墓地出土的1件铁斗斧（战斧？）则十分罕见，从其形态上看，显然与习见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鹤嘴锄有着直接的袭承关系。

在铁兵器中，西岔沟和老河深出土的铜柄铁剑、老河深和喇嘛洞出土的形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铁镞最为显著。

在马具类中，老河深出土的人冑和马衔、喇嘛洞出土的鞍桥包片以及包括人冑和马冑在内的甲骑具装等皆为骑马民族文化的典型遗物（图一）。

此外，从这3处墓地铁器的出土数量、在整个墓地随葬器物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每座墓随葬铁器的平均数量来看，铁器在与之共存的其他各类器物中都属于不可小觑的一类。据统计，喇嘛洞墓地的416座三燕文化墓葬中，计有310座随葬铁器，共出土各类铁器2740多件（副、套、枚、组），约占随葬品总数的35%以上，平均每墓随葬铁器8.84件；老河深中层墓葬共127座，其中随葬铁器的墓葬计90座，出土铁器520件左右，占随葬品总数（4200余件）的



图一 东北地区两汉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铁器（比例不等）  
1-4. 剑 5-12. 镞 13,14. 锥 15. 削 16. 斗斧 17-19. 铍 20. 环首器 21. 镦钉 22. 鞍桥包片  
(1、2、16. 西岔沟墓地出土 3-15. 老河深墓地出土 17-22. 喇嘛洞墓地出土)

12.4%，平均每墓随葬5.8件；西岔沟墓地共清理墓葬63座，出土铁器430多件，占随葬品总数(2247件)的19.1%，平均每墓随葬6.82件<sup>[3]</sup>。

由此可见，汉晋时期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墓地中，均具有以较多铁器随葬的丧葬习俗和传统文化，其中从每座墓葬随葬的数量来看，又以喇嘛洞墓地为最奢，这或许又是其一个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征。

总之，相对于年代相当或相近的城址、居址、窖藏等出土的铁器而言，从这3个墓地随葬的铁器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考古文化面貌来看，它们都属于一种以中原地区铁器文化因素为主的并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点的东北地区汉晋时期的墓葬铁器文化<sup>[4]</sup>。如果说在中原地区同东北地区铁器文化之间尚有一定差别的话，那么城址、居址等出土的铁器所表现的文化差别是一种地区性差别，而在墓葬铁器文化方面，这种文化差别则主要表现为一种

民族性差别。

这三处墓地均属于北方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墓地，尽管其族属尚存争议，诸如喇嘛洞墓地的“扶余说”、“宇文鲜卑或慕容鲜卑说”，西岔沟墓地的“匈奴说”、“乌桓说”和老河深墓地的“鲜卑说”、“扶余说”等<sup>[5]</sup>，然而，就其中的喇嘛洞墓地死者的族属而言，如历史地看则不难想见：经过东汉末年至东晋中期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迁徙、杂居和融合，前燕时期的慕容鲜卑或已演变为一个由本族、鲜卑化的汉、扶余和高句丽等族组成的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民族共同体。喇嘛洞墓地人骨标本的鉴定结果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墓地死者的遗传学构成并不单纯，而是一个“多源性同种系”的人群，即其体质特征的复杂性显示了其种系来源的多源性<sup>[6]</sup>。因此，那种试图将其判定为某个单一种族墓地的观点似乎都有偏颇。

墓葬出土的铁器同居址、城址、冶铁址和窖藏址等出土的铁器一样，为东北地区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然而，前者较后者具有如下优势：

首先是信息的多样性。在由遗迹和遗物构成的各类考古遗存中，墓葬是汇集有关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最为丰富的一类遗存。一座古墓的规格可能不大，然而它却可以通过自身遗构、死者残骸和随葬的各种遗物，将墓内铁器所涉及的上下逾千年、广袤数百里的历史文化浓缩于“方寸”之间，而由此所体现出的多样性信息更有利于进行考古学和金相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

其次是信息的相关性。人类是创造铁器文化的唯一主体。作为重要随葬品之一的铁器，与已化为人骨残骸的死者共存一处，为我们直观地考察这些铁器的随葬方式、与死者的位置关系、各种铁器之间的组合及与陶器和其他器物的共存关系等，进而探讨铁器时代的葬制、不同地区的葬俗以及死者的族属问题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是信息的统计学意义。每一座墓葬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遗存单位。在一处包括数十座乃至数以百计的墓葬的墓地中，随葬的铁器在数量、种类、形态、组合及金相的检测分析等方面，均可以为统计学研究提供难得的大样本数据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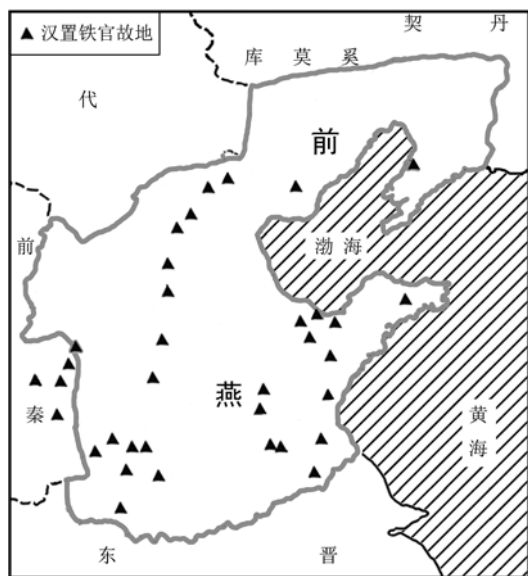
## 2. “葬铁之奢”随想

在整理喇嘛洞铁器的过程中，面对摆在铁架子上的这些密密麻麻、跨越千年的历史馈赠时，其铁的来源问题又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脑际萦绕。已发表的相关报告虽曾对此问题稍作探讨，但终觉言犹未尽<sup>[7]</sup>。毋庸置疑，对一个久居塞外，既缺少铁矿资源又尚未掌握冶铁技术的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来说，在经济落后、战乱频繁的历史条件下，实用性的铁工具、铁兵器和铁马具是多么的必需和宝贵！而尽可能地延长这些铁器的使用寿命又同样是那么的必要和重要！然而，他们为何毫不吝啬地将其作为随葬品大量地送入墓中，埋入地下？反观在既拥有铁矿资源又拥有冶铁基地以及掌握冶铁技术的人力资源的中原地区，又有哪一处汉人墓地的死者能够像喇嘛洞墓地的死者那样如此慷慨地“以铁为葬”，将当时大量

的实用铁器通过随葬的方式遗留给今天的我们？

探讨这一问题，除了要充分考虑到互市交易、汉廷馈赠及战争劫掠等因素之外，恐怕还得从慕容氏集团通过武力兼并的手段在北方地区实现短暂局部统一这个主因上说起。

如果打开历史地图就会发现，慕容鲜卑于337年所建立的前燕，其版图的北半部几乎包括今辽宁全境，南半部包括今河北、河南和山西大部，西抵今之晋陕交界的黄河一线，东部则包括了整个山东半岛，其南界已达今河南南阳至安徽蚌埠之间的淮河一带。这在当时中



图二 前燕境内汉置铁官故地分布示意图

国北方地区的十六国中，可算是一个南北纵贯千里、东西横联漠海的“超级大国”之一了<sup>[8]</sup>。慕容氏燕国的这一辽阔版图不仅囊括了位于最北部的辽东地区唯一的一处汉置铁官故地——平郭(今盖州市南)，也囊括了位于冀西北、豫中、鲁中和苏北地区的诸多铁官故地(图二)<sup>[9]</sup>。因此，慕容氏集团进行的这种军事扩张，很难不让人怀疑其是否带有以武力攫取汉置铁官故地为目的的意图。这也不难使人联想到在先秦时期，曾有夏商周三代为寻求铜矿资源而频繁迁都之举，其后又有齐国联合韩、魏攻取楚国宛、叶以北之地以及秦国为占宛、邓之地而举兵伐韩之例<sup>[10]</sup>。其中的宛(今河南南阳境内)即是当时最重要的产铁和冶铁基地之一。时隔千百年之后，历史的某种相似性在十六国时期的慕容氏集团东征南伐的过程中再次重现。前燕自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始，至370年被前秦所灭，前后历经33年。在此期间，慕容氏集团以占有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在尽享辽东平郭铁官故地之利28年的同时，又尽享今之河北、河南乃至山东境内诸铁官故地之利18年。在前秦灭亡之后，慕容氏集团又乘机复国，于384年在前燕故地建立了后燕。其版图面积虽不及前燕，但仍囊括了曾为前燕所占据过的大部分铁官故地。这样，后燕继前燕之后，又尽享中原地区铁官故地之利25年，直到409年为北魏所灭。试问：在群雄并起争霸的十六国时期，在与东晋汉廷并立称王的诸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最早一统中原地区的铁官故地并曾两度占有之？没有，唯慕容氏的前燕和后燕而已。

前燕这一庞大帝国的建立，使得慕容氏集团在尽占天时(历经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继之而起的东晋实力大减，仅偏安江南一隅，无心北顾)与人和(在慕容廆至慕容皝时期长达数十年的兼并战争中，慕容氏集团通过招抚流民的政策和人口掠夺的手段来吸纳中原士族，网罗汉族工匠)



的同时，通过强势的东征和南伐，兼并高句丽，灭掉冉魏，进而达到吞并其辖境内的汉代铁官设置故地之目的，最终又尽占了铁器自给之“地利”。

显然，只有在这种短暂的局部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辽东铁官故地所产铁器的频繁西调和今之冀鲁豫境内诸多铁官故地所产铁器和板材的大量北输才会成为可能。这也许是喇嘛洞墓地的死者们所具有的对铁器进行如此“挥霍性消费”的“底气”和“资本”的由来。因此，地处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的喇嘛洞墓地随葬的大量铁器的来源，只有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去考察才能予以比较合理的解释和理解。

除了上述铁器来源的因素之外，致使其以大量铁器随葬者，似乎还有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入主中原后的慕容氏贵族的某种“土豪心态”。铁器的大量应用不仅促进了屯垦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大大推动了以慕容氏部族为主体的鲜卑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作为封建私有制下的一种重要财富，铁器在经济和军事上重要性的彰显、铁器来源后顾之忧的消除以及铁器供应上的相对稳定和充裕，所有这些均不可避免地会对处在社会转型期中的慕容氏集团的铁器消费观念产生影响，进而滋蔓出某种通过大量随葬铁器这种“挥霍性消费”来炫富的“土豪心态”，并引起了鲜卑社会的普遍仿效。于是，在喇嘛洞墓地随葬铁器的300多座墓葬中便可看到这种情景——贵族大墓内自然是铁器充盈，数量可达数十件以上；略为富有的死者也不惜倾其所有，将生前使用过的铁器悉数入葬，墓内铁器多在十件左右，其中不乏有以残器或制作草率，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铁明器来凑数的随葬者；贫者随葬不过1-2件，而在更加“赤贫化”的上百座墓葬中竟无1件铁器随葬——这确然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此，铁器随葬数量的多寡，已使得当时鲜卑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别加大的现象更加突出和明显。

二是鲜卑社会的“贵兵死”习俗。从年龄上看，铁器主要随葬于处在24—35岁和36—55岁两个年龄组内的死者墓葬中。在这两个年龄组中，计有男性墓葬130座，随葬铁器共1600多件，约占铁器总数的58.4%，平均每座随葬12.4件。若以随葬20件以上铁器的25座墓葬为例，则除了I M5为56岁以上男性、II M209和II M370为女性墓葬之外，其余22座均为24—55岁的男性墓葬，其中又以24—35岁的青壮男性为最多，共12座。可见，在鲜卑社会生产和军事活动中，男性青壮年及55岁以下的中老年是铁器使用的主体。他们生前从垦从军，死后又不惜以铁厚葬。在这里，对铁器的占有和铁器随葬的多寡，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籍中所记载的当时鲜卑社会普遍存在着的那种“贵少而贱老，其性悍鸷”“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宠少壮、尚勇武、厚殓战死者的丧葬习俗和观念<sup>[11]</sup>。如前所述，从两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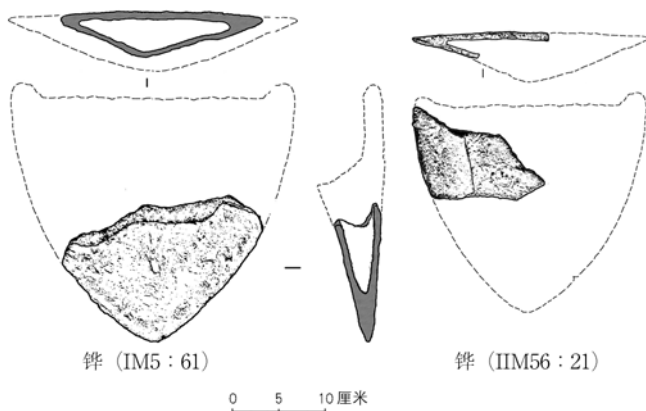
期的西岔沟墓地和老河深墓地到十六国时期的喇嘛洞墓地，以铁器厚葬战死者似乎已成为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遗俗而得到保留和袭承。

### 3. 残铍之谜试解

在考古发现的铁质文物中，铁铍无疑是规格最大的铸铁件。在经过金相鉴定的39件喇嘛洞铁器中，有2件铁铍标本值得注意，其出土编号(实验编号)分别为 I M5 : 61(7136)和 II M56 : 21(7151)<sup>[12]</sup>。这两件标本皆为残损的铸铁件，其金相组织均为亚共晶白口铁。从残损程度来看，以铍 II M56 : 21为最，平面形状不规则，仅存一小部分边刃和銚口。残长17.7、残宽10.8、厚0.5—0.9厘米；I M5 : 61为局部残损，舌状铍，边刃外弧，正面中间略起一道纵向凸棱。正面中部略起脊，銚口呈三角形。残长14.5、残宽19.5、残高4.2、壁厚0.4—0.7厘米(图三)。这类残损的铁铍在 I M10、I M22、II M49和 II M218等墓中也有发现。此外，在与铁铍伴出的犁镜这类大型铸铁件中也有残损现象。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从这些残损的铁铍和犁镜上打下来的铸铁残块都哪里去了？

对这一现象，我们似乎也可以用“毁器”习俗来解释。但问题是，如果在死者下葬时，一定要用损毁的铁器来满足当时的生者对死者的某种祭奠心理需求的话，那么除了利用更易于损毁的规格较小的铸铁件诸如、铲等之外，为何一定要不惜“血本”(可以想见，像铁铍这样大型的铸铁件，对其拥有者来说，在当时不能不算是一笔重要财富)，费尽蛮力地将铁铍这种最为硕大厚重的铸铁件砸残甚至砸毁呢？也许，将其砸毁为若干残块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在自用作明器的同时再分送给别的死者做随葬之用吧？然而，在其他墓内并未见有可与之拼复的相应残块。因此，问题的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即这些被有意损毁的铁铍的一部或大部，可能已被用作了炒钢的原料。

据研究，在两汉时期的铁器管理方面，汉廷实行“限冶供铁”的政策，即在铁官治下，在禁止边远地区私营冶铸的同时，由中原地区南阳一带的大铁官向周边地区以“均输”的方式外供铁器或制作铁器的板材<sup>[13]</sup>。当然，其中的铁器成品只会限于农具和生活用品，而冷



图三 铁铍残片复原示意图

兵器这种类似于“军火”的产品当会在严禁之列的，以避免生边患之虞。显然，这种供铁政策对于塞外北疆地区，尤其是处在兵燹四起、战乱不断的十六国时期的鲜卑等少数民族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的，特别是对各种兵器的需求更是如此。从喇嘛洞墓地出土的铁器来看，兵器的种类虽不及生产工具，但其数量却多于前者，达860多件，其中刀、剑、矛这类长大兵器近300件。

就这些为数众多的兵器而言，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贸易途径来获得的情况下，其来源无非有两个：一是通过战争途径从敌方缴获，二是“自力更生”仿制生产。对所需重要原料——炒钢，除了可能通过“均输”或互市等途径获得一部分板材之外，另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板材有限时去毁犁取铁，再由迁徙或劫掠过来的掌握炒钢技术的汉族工匠反复加热锻打进行炒炼制作所需的各类兵器。喇嘛洞墓地铁器的金相鉴定结果也表明，在39件铁器标本中，以炒钢制品为最多，共16件，明显多于铸铁脱碳钢；而在16件炒钢制品中又以兵器为多。这表明炒钢技术已成为主要的制钢技术，并被广泛应用于兵器制作上<sup>[14]</sup>。成语中有“铸剑为犁”一说，意为息战兴农、化战争为和平。与此相反，慕容鲜卑的这种求得炒钢原料的方法则明显属于一种“毁犁锻剑”的行为。或许，这是在当时汉廷实行的“限冶供铁”政策的限制与北方少数民族对冷兵器的大量需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时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行为吧！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似应在慕容氏集团尽占中原地区铁官故地的前燕建立之前，炒钢原料的供应相对比较紧张之时，而不应是在此时以后。

此外，需捎带提及的是，作为一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书，《榆树老河深》的一个缺陷是铁器形态与金相之间缺少必要的对应性，亦即经过金相鉴定的铁器往往不见有相应的表现铁器外观形态的线图或照片，由此所反映的铁器信息还只是一种“只窥一斑，难见全貌”的碎片化信息。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受考古发掘报告体例、篇幅所限，一方面是受检测取样技术所限——为避免对完整铁器的破坏，有损检测只能尽量选择残损铁器取样，而这些经过检测的残损铁器又往往会被报告的编写者所忽略。关于这一点，还需合作的双方能够予以适当的注意和改进。

#### 4. 一点感言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从匍匐于地到直立前行，经历了三个既漫长而又短暂的难忘时代。C. 汤姆逊提出的著名的“三期说”虽已被学界所公认，但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无非经历了两个“大时代”，即漫长的石器时代和短暂的金属时代。这两个“大时代”又分别包括了考古学对考古学文化所划分的四个“小时代”，即分别属于石器时代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分别属于金属时代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四个时代中，铁器时代是一个最为短暂且又最为重要的时代。以生铁冶炼和柔化锻打为重要特点的中国古代钢铁制造技术的发明以及应用这一技术制作出来的大量铁器，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

化的巨大影响，这都是其他三个时代的新、旧石器和青铜器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中，铁器无疑应是我们研究铁器时代的最主要和重要的实物资料，铁器及铁器研究应该占有其应有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皆已真正成为古老的过去，似乎只有铁器时代的铁器还在穿越过去并通过当今之钢铁时代执着而又普遍地关联着我们，为我们默默地承担着无所不在而又无所不能的“工具”这一重要角色。然而，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经过近百年来的考古学偏爱，已使得石器和青铜器皆分别在各自时代的研究领域中独占鳌头。相比之下，只有铁器时代的铁器还仍然在“享受”着一种久被轻慢的不公正待遇。

古代铁器的最大特性是什么？它既是一种矿藏最大、成品数量最多、硬度最高、应用最广的金属文物，同时，由于它易于锈蚀，且面目“丑陋”，因而也是一种最为脆弱、最不受待见的金属文物。迄今为止，同其他金属文物相比，铁器的保护和研究还仍只是一种为数不多者的专业行为。人们对古代铁器的态度，似乎仍难以完全摆脱“铜贵铁贱”这种如同破烂王一样的认识水准的局限，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值钱与不值钱”这种世俗化的价值观所左右，对发掘出土的铁器或整理不及时、或保护不到位，对其中的残破者则不编号、不登记甚至随意弃之的轻慢之举也时有所见。

在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似乎还仍然想象不出在未来世界中能够完全取代人类所赖以生存的钢铁的新材料会是什么，更不能想象的是，现代人类文明大厦如果离开钢铁的支撑将会变得何等脆弱。有鉴于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津津乐道于金银铜、瓷玉陶这些“古董”之余，拿出一点热心和耐心去了解和善待一下古代铁器的话，那实在是一件学术幸事。因为学术的可贵之处，不在其如何高深，令常人景仰，而在其不容世俗，没有偏爱，一切以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为准。只有了解古代铁器，才能进一步了解现代钢铁文明的过去，只有了解这一过去，才能更好地期待和把握现代钢铁文明的未来，真正做到善待创造这一文明的人类自己。

#### 注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原发掘报告将喇嘛洞墓地的相对年代推定在3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现在看来或许略为偏早，似应将其推定在4世纪初至晚期为宜，即其上限在前燕建国前后不久，下限可能晚至后燕。
- [2]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1960年8、9期（合刊）；吉林省文化考古研究所编：《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 [3] 有关喇嘛洞墓地的数据系待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书《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中的统计资料，其中出土器物的总数尚未最后确定。如略有变动，则以正式发表者为准。老河深和西岔沟的统计数据参见注[2]，其中后者的铁镞数量不详，故未计入。
- [4] 有一种观点认为，三燕文化的上限应在352年慕容廆灭掉冉魏、创建燕国之时，而不应是始于慕容皝自立燕王时的337年。因此，若以352年为界，则其前的慕容鲜卑文化应属于东晋文化范畴，其后才可以是与东晋文化并列的三燕文化。参见孙进己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10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1989年9月第1版。

- [5] 同注[1]。另参见田立坤：《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二），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陈平：《辽西三燕墓葬论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曾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史迹论》，《考古》，1961年第6期；刘景文等：《吉林榆树老河深墓葬群族属探讨》，《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 [6] 陈山：《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158页及朱泓所撰序言部分，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 [7] 同注[1]。
- [8]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9-10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
- [9] 本文中的图二参照《中国古代科技史·矿冶卷》（韩汝玢主编，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506页，图8-3-1绘制而成，特予说明。
- [10] 高蒙河：《铜器与中国文化》，10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参见陈建立：《从铁器的金属性研究看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 [11]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卷九十。乌桓，又作乌丸，在《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卷三十裴松之注中也有同样记载。
- [12]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等：《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铁器的金相实验研究》，《文物》，2001年第12期；陈建立等：《汉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钢铁技术研究》，75页，表5.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 [13] 李京华：《中国秦汉冶铁技术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2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 [14] 同注[12]。





# 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整理随筆四題

万 欣

## 1. 墓葬鉄器の「民族性」議論

喇嘛洞墓地は国内でこれまで発見された最大規模の三燕文化墓葬を中心とした墓地で、年代は3世紀末から4世紀中葉である<sup>(1)</sup>。出土鉄器量の多さ、豊富な種類、鉄器副葬の普遍性は、いずれも現在のところ国内では稀な事例である。東北地区において、現在まで発見されている遺跡のうち、この墓地と直接比較できる墓葬は、遼北地区丘陵地帯の西岔溝墓地（前漢武帝～昭帝初期、紀元前約140年～前80年）と吉林北部松嫩平原の老河深墓地中層墓葬（前漢末期～後漢初期、紀元前約1世紀後期～紀元後1世紀初）があるのみである<sup>(2)</sup>。すでに発表されている上記二遺跡の関連鉄器資料をみると、いずれも中原地区の文化要素と地域性・民族性要素が共存する鉄器文化に属しているのがわかる。相対年代において、喇嘛洞墓地は上記2遺跡との間に3、400年の開きがある。鉄器文化の様相では、喇嘛洞墓地の鉄器群は2遺跡よりも漢文化の要素が一層強く現れるとともに、その地域性・民族的要素がさらに明確な特徴として加わっている。すなわちそれは犁、鍬などの農具、斧、手斧などの手工具であり、このような漢式生産工具が大量に出現するとともに、鞍金具、馬冑、甲冑といった鉄製馬具と防具系統もまた、同時期に形成された。

これら3カ所の墓地出土鉄器を総覧すると、その地域的・民族的特徴は主に以下のとおりである。

鉄製工具類のうち、素環頭刀子（環首小刀）と錐類の比重はともに大きく、西岔溝墓地からは鉄製工具が250余点、老河深墓地からは刀子97点、錐65点が出土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小型工具の大量の出現と使用は、明らかに食肉加工と各種皮革製品の製作と関係があり、北方遊牧民族の生産と生活の特徴を反映している。喇嘛洞墓地では削を含む刀子類は約250点が出土しているが、錐は存在しないようで、そのかわりにあらたに一種の漁撈具—氷用穿孔具が出現する。このほか、西岔溝墓地から出土する闕斧は出土自体が稀で、その形態は北方草原地域でよくみられる青銅製鶴嘴と直接的な系譜関係にあるのはあきらかである。

武器は、西岔溝、老河深出土の青銅柄鉄剣、老河深、喇嘛洞出土の多様化ならびに特殊化した形態の鉄鏃がもっとも主要な器種である。

馬具類は、老河深墓地出土の甲冑と銜、喇嘛洞墓地出土の鞍金具および甲冑と馬冑を含

む重装騎兵の防御武具などがあり、いずれも騎馬民族文化の典型的な遺物である（図一）。

このほか、上記三墓地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の量、これらが全墓地の副葬品に占める割合、および各墓における副葬鉄器の平均量からみて、鉄器は共伴する各種副葬品のなかでも軽視できない一群である。統計をみると、喇嘛洞墓地416基の三燕文化墓葬のうち、310基が鉄器を副葬し、各種鉄器が合計2740点（セットを含む）あまり出土している。これは副葬品総数のおよそ35%以上を占め、1基あたりの鉄器副葬数は平均で8.84点となる。老河深中層墓葬は計127基あり、このうち鉄器を副葬する墓は90基、出土鉄器は520点前後である。これは、副葬品総数（約4200点）の12.4%を占め、1基あたり5.8点が副葬されていた。西岔溝墓地では調査された計63基の墓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は430点で副葬品総数（2247点）の19.1%を占め、1基あたり6.82点を副葬していた<sup>(3)</sup> ことがわかる。

以上より、漢晋期における東北地区の少数民族墓地では、いずれも比較的多くの鉄器を副葬する埋葬習俗と伝統文化があり、このうち、各墓に副葬された数量からみると喇嘛洞墓地がもっとも豪華で、これは彼らの地域性や民族的特徴とみ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つまり、同時期あるいは近接する時期の城址、集落址、土坑など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と比較すると、上記3墓地の副葬鉄器およびそこに反映される考古文化の様相からみて、それらはいずれもある種、中原地区の鉄器文化要素を主とする鮮明な地域性と民族的特徴を帯びた東北地区漢晋墓にみられる鉄器文化に属している<sup>(4)</sup> ことがわかる。中原地区と東北地区の鉄器文化の間になお一定の違いがあるとすれば、城址や集落址等における出土鉄器が示す文化の差は、一種の地域性の違いであり、墓地における鉄器文化の差はすなわち、一種の民族性の差の表出といえる。

この三墓地はいずれも北方地区の古代少数民族墓地であり、その民族については今も論争がつづいている。すなわち、喇嘛洞墓地の「扶余説」、「宇文鮮卑あるいは慕容鮮卑説」、西岔溝墓地の「匈奴説」、「烏桓説」、老河深墓地の「鮮卑説」、「宇文説」<sup>(5)</sup> 等である。このうち、喇嘛洞墓地被葬者の民族についていえば、歴史的にみて推察は難しくない。すなわち、後漢末年から東晋中期にかけておこなわれた、1世紀以上の民族移動、雑居と融合をへて、前燕期の慕容鮮卑は本族、鮮卑化した漢人、扶余や高句麗等の人びとが形成した一定の血縁関係のある民族共同体にすでに変化していた。喇嘛洞墓地における人骨の鑑定結果からも、まさにこの点が証明されている。すなわち、被葬者の遺伝学的構成は単純ではなく「多源的同種系」集団であり、形質学的特徴の複雑性は、その起源が多源的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sup>(6)</sup>。鑑定結果からも、ある単一種族の墓地であると判定する観点は不適切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

墓葬出土鉄器は、集落址、城址、製鉄遺跡、土坑などから出土した鉄器と同様に、東北

地区の鉄器時代の考古文化研究において重要な資料である。しかし、前者は後者よりも以下の点で有益である。

まず、情報の多様性がある。遺構と遺物が構成する各種考古遺跡のなかで、墓葬は関係する古代社会の歴史・文化情報がもっとも豊富に集まった種類の遺跡である。1基の墓の規模は大きくないとはいえ、遺構自体が、被葬者、各種副葬遺物を通じて、墓内の鉄器が関係した上下千年を超え、広さ数百里におよぶ歴史文化を墓内平方メートルのなかに凝縮させたものであり、ここに表れる多様な情報は、考古学や金相学など、多分野の総合研究に一層有利である。

次に情報の相関性がある。人類は鉄器文化を作り出した唯一の存在である。重要副葬品のひとつである鉄器は、すでに人骨と化した被葬者と同所にあり、我々にこれら鉄器の副葬方式、被葬者との位置関係、各種鉄器の組み合わせ、および土器とその他遺物との共伴関係などを直接的に考察する機会をあたえ、さらには鉄器時代の葬制、異なる地域の葬俗および被葬者の民族問題などを研究するための貴重な第一次資料を提供する。

第三に、情報の統計学的意義がある。1基の墓はいずれもひとつの独立した遺構単位である。数10基ないし100基を数える墓を含む墓地において、副葬された鉄器は量、種類、形態、組み合わせ、および金相分析などの面で、統計学分析をおこなう上での貴重な基礎資料を提供する。

## 2. 「葬鉄の奢」随想

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の整理過程で、収蔵庫のスチールラック上に隙間なく並ぶ、千年の時を超えた歴史の贈り物と対面するたびに、これら鉄がどこから来たのかという来源問題は、我々の頭のなかから片時も離れないかのようであった。すでに発表された報告では、この点に関して若干研究されているとはいえ、十分とはいえない<sup>(7)</sup>。長く塞外に居住し鉄鉍資源が欠如、または治鉄技術を掌握していな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からすると、経済的に遅れ、戦乱が頻繁におこる環境下で、実用的な鉄製工具、武器、馬具がいかに必需品で貴重であったか。可能な限り、鉄器の使用寿命を延ばすことが、鉄器の入手と同様にいかに必要で重要であったかは、疑う余地はない。けれども彼らはなぜ、惜しむことなくそれらを副葬品として大量に墓中に納め、地下に埋めたのだろうか。すでに鉄鉍資源を擁し、また治鉄基地および治鉄技術に通じた人的資源を擁した中原地域にあっても、どの漢人墓地の被葬者も喇嘛洞墓地の被葬者のように気前よく「鉄を以て葬を為す」ことはできていない。喇嘛洞墓地の集団は、当時大量の実用鉄器を副葬するという方法を通して今日の我々になにを残したのだろうか。

この点について、慕容氏集団が短期間で北方地区の統一を実現させた主要因は、互市で

の交易、朝廷からの下賜、そして戦争による略奪等の諸要素に加え、武力をともなった手段であったであろう。

歴史地図を開くとすぐわかるように、慕容鮮卑が337年に建てた前燕は、その版図の北半部が現在の遼寧省のほぼ全域、南半部は現在の河北、河南、山西省の大部分を含んでいた。西は現在の山西省と陝西省の境である黄河ライン、東は山東半島全体を覆い、南の境は河南省南陽から安徽省蚌埠の間の淮河一帯まで達していた。これは当時、中国北方地区の十六国において、南北は千里を貫き、東西はゴビから海に繋がる「超大国」のひとつに数えられる<sup>(8)</sup>。慕容氏燕国のこの広大な版図は、最北部の遼東地区唯一である漢鉄官故地の平郭（現在の蓋州市南）を含むだけでなく、河北北部、河南中部、山東中部と江蘇北部地区の多くの鉄官故地を含んでいた<sup>(9)</sup>（図二）。このため、慕容氏集団が進めた軍事拡張は、武力で漢の設置した鉄官故地を奪うことを目的とする意図があったことは想像にかたくない。これはまた、先秦期に夏商周三代が銅鉞資源を求めて遷都をおこなったこと、その後もまた斉が韓、魏と連合して楚国の宛、葉以北の地を攻略したこと、秦が宛、鄭の地を得るために挙兵して韓を討った例などを想起させる<sup>(10)</sup>。そのなかの宛（現在の河南省南陽）は当時もっとも重要な鉄生産基地のひとつであった。千百年の時をへた後、歴史のある種の相似性を、十六国期の慕容氏集団の東征南伐過程にみてとれる。前燕は337年に慕容皝が燕王を称して始まり、370年に前秦に滅ぼされるまで33年間続いた。この期間、慕容氏集団は占領者と統治者の身分で遼東平郭の鉄官故地の利を28年間享受し続けるとともに、現在の河北、河南、さらには山東域内の諸鉄官故地の利を18年間享受した。前秦滅亡後、慕容氏集団は再び機に乗じて復国し、384年に前燕故地に後燕を建てた。その領土面積は前燕におよばなかったものの、かつて前燕が占領した大部分の鉄官故地を有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このように、後燕は前燕を継いだ後、409年に北魏に滅ぼされるまで、中原地域の鉄官故地の利を25年間享受した。群雄が割拠し覇を争った十六国期において、東晋朝廷と並び王を称した多くの北方少数民族政権のうち、もっとも早く中原地区の鉄官故地を支配下に置ことができ、しかも二度、その地を占有した国があっただろうか。それはただ、慕容氏の前燕と後燕があったのみである。

前燕というこの巨大帝国の建国は、慕容氏集団に時機（西晋末年の八王の乱をへて成立した東晋は、国力が大いに低下し、江南の片隅に甘んじて北を顧みなかった）と人の和（慕容廆から慕容皝期の数十年にわたる戦乱のなかで、慕容氏集団は流民を宣撫する政策や人間略奪という手段を用いて中原士族を取り込み、漢人工人を集めた）を掌握した。と同時に、強力な東征南伐で高句麗を併合して冉魏を滅ぼし、さらにはその領域の漢代鉄官が設置された故地を併合するという目的を果たし、最終的には鉄器自給の「地の利」を独占した。

このような短期間での局地的な統一という歴史背景があったからこそ、遼東鉄官故地で



生産された鉄器の頻繁な西への移動、そして冀魯豫域内（現在の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の多くの鉄官故地で生産された鉄器と板材の北への大量移動が可能となったのである。これはまた、もしかしたら、喇嘛洞墓地の被葬者たちが有する鉄器に対して「濫費型消費」をする「意気」と「資本」の由来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ゆえ、遼西地区大凌河流域の喇嘛洞墓地に副葬された大量の鉄器の由来は、このような歴史背景下で考察してこそ、合理的な解釈と理解が可能となるのである。

上述した鉄器の由来という要因以外に、その大量の鉄器副葬の背景には、さらに以下の二つの要因があったようだ。

ひとつは、中原の主となった後の慕容氏貴族の、ある種の「土豪精神」である。鉄器の大量使用は屯田開墾経済の発展を促進するだけでなく、対外軍事拡張を進めるうえでもまた、重要な影響をおよぼした。と同時に、政治上でもまた、慕容氏部族を主体とする鮮卑社会の封建化を大いに促進させた。封建私有制下の重要な財産として、鉄器の経済・軍事上における重要性、鉄器生産源に憂慮がないこと、および鉄器供給における相対的な安定と豊富さというこれらはすべて、いずれも社会転換期にあった慕容氏集団の鉄器消費観念に対して不可避の影響を与えた。さらには、蔓延する大量鉄器副葬による「濫費型消費」が絢爛な「土豪精神」を生み、そしてまた鮮卑社会の普遍的模倣を引き起こした。よって、喇嘛洞墓地において、鉄器副葬のある300基以上の墓からは次のような光景がみられるのである。貴族の大型墓は基本的に鉄器で満ちており、その副葬量は10点以上におよぶ。やや裕福な被葬者もまた、その副葬を惜しまず、生前に使用した鉄器をことごとく副葬するため、墓内の鉄器は10点前後を数えるものが多い。そのなかで少なくないものが完形ではないか、いい加減な作りのもので、実用価値のない明器鉄器で数を合せた副葬であった。貧しい者は1～2点を副葬するにすぎず、さらに「赤貧化」した100基にのぼる墓では、ひとつの鉄器の副葬もない。これは明らかに我々の予想外であった。よって、副葬鉄器数の多寡は、すでに当時の鮮卑社会における両極分化と貧富の差が拡大した現象をより強調し、かつ明示している。

2つ目は、鮮卑社会の「兵死を貴ぶ」習俗である。年齢からみて、鉄器は主に24～35歳と36～55歳の2つの年齢グループの墓に副葬されていた。この2つのグループのうち、男性墓は130基あり、副葬鉄器は全部で1600点以上で鉄器総数量の58.4%を占め、1基あたりの平均は12.4点である。20点以上の鉄器を副葬する25基の墓を例にすると、ⅠM5号墓が56歳以上の男性、ⅡM209号墓とⅡM370号墓が女性であることを除き、残りの22基はいずれも24～55歳の男性の墓であった。また、このうち24～35歳の青壮年が最多で合計12基を数える。以上より、鮮卑社会の生産と軍事活動において、男性の青壮年および55歳以下の中・老年が鉄器使用の主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出来る。彼らは生前、開墾と軍事に従事

し、死後もまた、鉄を惜しげもなく副葬し、厚葬をおこなった。このような鉄器の所有と副葬鉄器の多寡には、史籍中に記載された当時の鮮卑社会に普遍的に存在した習俗と観念をみてとることができる。すなわち、「少きを貴び而して老を賤しみ、其の性悍塞」、「俗、兵死を貴び、尸を斂むに棺を以てし、哭泣の哀有り、葬に至らば則ち歌舞し相送る」とあり、そこには若く壮健であることと武勇を貴び、戦死者を厚く葬る葬俗と観念が反映されている<sup>(11)</sup>。前述のように、鉄器によって死者を厚く葬ることはすでに東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の一種の習俗であり、両漢期の西岔溝墓地と老河深墓地から十六国期の喇嘛洞墓地にいたるまで、それが保存・継承されていたのである。

### 3. 犁残片の謎に関する試論

考古学的調査を経て発見された鉄資料のうち、犁は間違いなく铸铁製品のなかで最大のものである。金相鑑定した39点の喇嘛洞鉄器のうち、2点の犁資料は注目に値する。その出土資料番号（実験番号）はそれぞれⅠM5:61(7136)とⅡM56:21(7151)である<sup>(12)</sup>。この2点の資料はともに破損した铸铁品で、その金相組織はいずれも亜共晶白铸铁であった。残存度からみると、犁ⅡM56:21が最たるもので、平面形は不定形で一部の側刃と袋部のみ残る。残存長17.7cm、残存幅10.8cm、厚さ0.5~0.9cmである。ⅠM5:61は先端部片で、舌状に尖り、側刃は弧状をえがき、正面中央には一本の縦方向の凸線がのび、全体的にやや突出する。袋部断面形は三角形を呈する。残存長14.5cm、残存幅19.5cm、残存高4.2cm、厚さ0.4~0.7cmである（図三）。このような破損した犁はⅠM10、ⅠM22、ⅡM49、ⅡM218などの墓内からも発見されている。このほか、犁とともに出土した犁鏡（泥除）という大型铸铁製品もまた、破損した状況であった。これによって生まれる疑問は、一部が破損するこれらと接合する残りの铸铁残片はどこへ行ったのかである。

この現象については、「毀器」習俗から解釈できるだろう。しかし問題は、もし死者を埋葬する際に破壊した鉄器を用いることで、生者が死者に対する供養の気持ちを満たす必要があったのであれば、破壊しやすい鋤や鍬、鍬といった小型品をもちいればよいのにもかかわらず、「元手」（犁のような大型铸铁製品はその所有者からすると、当時重要財産であ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を惜しまず、犁というこの種のなかでももっとも大きく重厚な铸铁製品を荒々しく破壊さえしたのだろうか。もしそれを壊していくつかの破片にすることが目的ならば、自身のものを明器とするとともに、別の被葬者に分配して副葬に用いるのが好都合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しかし同一個体に接合できる破片はほかの墓からもいまだ出土していない。このことから、問いの答えはただひとつである。つまり、このように故意に壊された犁の一部あるいは大部分は、炒鋼の原料として用いられた可能性がある。

これまでの研究によると、両漢期の鉄器管理では、朝廷は「生産を制限して鉄を供給す

る」政策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すなわち、鉄官のコントロールのもと、辺疆地域での私鑄を禁止するとともに、中原地区の南陽一帯の大鉄官から周辺地域に「一元供給」する方式で鉄器、あるいは鉄器を製作する板材を供した<sup>(13)</sup>。そのうちの鉄製品は農具と生活用品に限られ、武器に類する製品は当然厳禁であり、辺疆地域における反乱が生じるのを防いだ。このような鉄供給政策は塞外北疆地域、とりわけ戦禍が四方に広がり戦乱が続いた十六国期の鮮卑など少数民族からすると、とてもその需要を満たすものではないのは明白で、とくに武器類に対する需要は到底十分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喇嘛洞墓地出土の鉄器からみて、武器の種類は生産工具に及ばないとはいえ、その数量はかえって前者よりも多く、860点以上に達し、そのなかで刀、劍、矛といった大型の長兵類は300点近くある。

これら数多くの鉄製武器が出土することから、正常な貿易経路では獲得できない状況下では、その供給源は2つしかない。ひとつは戦争を通して敵から獲得すること、もうひとつは「自力で再生」する模造生産である。必要とする重要な原料、つまり炒鋼は「一元供給」あるいは互市などからのルートで獲得できた一部の板材をのぞくと、板材が手に入らない場合は犁を壊して鉄を得て、遷徙あるいは略奪してきた、炒鋼技術を有する漢人工人によって再び加熱鍛打、溶融製錬して必要な各種鉄器が製作された。喇嘛洞墓地鉄器の金相鑑定結果もまた、39点のうち、炒鋼法による鉄製品が16点と最も多く、鑄鉄脱炭鋼よりも上回ることが明らかとなっている。そして16点の炒鋼製品のなかではまた、武器が多くを占める。これは炒鋼技術がすでに主要な鋼製作技術となっており、かつ武器製作に広く応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を示している<sup>(14)</sup>。成語に「劍を鑄て犁と為す」という記述がある。戦をやめて農を振興し、戦争から平和へ変わる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これとは逆に、慕容鮮卑の炒鋼原料を得ようとする方法は、ある種「犁を壊して劍を鍛える」行為であった。もしかしたら、これは当時の漢朝廷がおこなっていた“生産を制限して鉄を供給する”政策と北方民族の武器に対する大量需要の間の矛盾がかなり大きくなったときに採られた、やむを得ない行為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当然ながら、このような現象の発生は慕容氏集団が中原地域の鉄官故地を占領する前燕建国前、炒鋼原料の供給が相対的に逼迫していたときであったに違はなく、建国以降ではないだろう。

このほかに言及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のは、考古報告書として正式出版された『榆樹老河深』についてである。この報告書のひとつの難点は、鉄器の形態と金相の間の必ずしも高くない対応性である。すなわち、金相鑑定をした鉄器は往々にして実測図あるいは写真が掲載されておらず、このため鉄器に反映される情報はただ「一点のみをのぞき見て、全貌を把握したい」細片の情報なのである。このような状況となってしまった要因としては、ある面では考古発掘報告に体裁と紙幅の限りがあるためであり、またある面では測定サンプルの採取法による制限、つまり完形鉄器の破壊を避けるために、破損測定はできる

だけ破損資料を選んでおこなわれた。そしてこのように測定された破損鉄器はまた往々にして、報告書執筆者に粗末に扱われるのである。この点に関しては、共同研究を行う双方が適切に注意し改善する必要がある。

## 4. 若干の思い

歴史の長い流れのなかで、人類は地を這う状態から直立歩行し、三つの長期あるいは短期の忘れがたい時代をへてきた。C.トムセンが提示した有名な「三時期法」はすでに学界の公認するところとなったが、実際には人類社会のこのような発展過程には二つの「大時代」、すなわち長期間の石器時代と短期間の金属時代をへたにほかならない。この二つの「大時代」はまた、考古学が考古学文化に即して区分した四つの「小時代」、すなわち石器時代に属する旧石器時代と新石器時代、金属時代に属する青銅器時代と鉄器時代を含んでいる。この四つの時代のうち、鉄器時代はもっとも短く、またもっとも重要な時代である。銑鉄煉冶と鍛打柔化を重要な特徴とする中国古代の鋼鉄製造技術の発明、およびこの技術で製作された大量の鉄器は、人類社会の政治・経済・軍事・文化に対して巨大な影響を与えた点で、いずれもその他、新石器・旧石器・青銅器時代とは比べものにならない。このため、全人類社会の発展史の研究において、鉄器は我々が鉄器時代を研究するもっとも主要で重要な実物資料であ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く、鉄器および鉄器研究は重要な位置にある。今日になって石器時代と青銅器時代はいずれも真に遠い過去となっているが、鉄器時代と鉄器は過去を通り抜けて現在の鋼鉄時代へといたる。また普遍的に我々に関係しており、我々のために黙々と、いたるところで万能の「工具」という重要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る。しかし多少残念なのは、嗜好が偏っているためか、中国では約100年の考古学のなかで、すでに石器と青銅器はともに各時代の研究領域において首位を独占しているのに対して、鉄器時代の鉄器のみは依然、ぞんざいで不公正な扱いを「享受」し続けていることだ。

古代鉄器の最大の特徴はなにか。それは埋蔵量が最大で、製品の数がもっとも多く、硬度は最高で、もっとも応用幅の広い金属製品であることである。と同時に腐食しやすく、見た目が「醜い」ことからまた、もっとも脆弱で顧みられることのない金属製品でもある。現在にいたるまで、そのほかの金属製品と比べて鉄器の保護と研究は今なお数の少ない専門調査である。人々の古代鉄器に対する態度は、まるでまだ「銅を貴び鉄を賤しむ」というようなほろ屑同然の認識水準の範囲を完全には脱却しがたいようで、意識的あるいは無意識的に「金になるのか、金にならないのか」という世俗的な価値観に左右されている。そのため、出土した鉄器に対しては整理が迅速でないか、あるいは保護が一定水準に達しておらず、さらには破損したものは遺物番号を与えられることもないまま出土遺物としても登録されず、極端な場合には、適宜これを棄てるという傲慢なおこないも時にみら

れる。

科学技術が高度に発達した時代において、我々は依然、未来世界において人類が生きるために頼ってきた鋼鉄に完全に代替しうる新材料が何なのかイメージできないでいる。さらには、現代の人類文明がもし鋼鉄の支えから逸脱したら、いかに脆弱に変わるのかイメージできない。よって、もし我々が金銀銅・瓷玉陶というこれら「骨董」の類に興味津々であるように、熱心かつ辛抱強さをもって古代鉄器を理解し大切にしたいならば、それは本当に學術の幸事である。學術の貴ぶべきところは、それがいかに高度であり、普通の人に景仰の念を抱かせるかにあるのではなく、それが世俗に受け入れられなくとも偏愛することなく、すべては研究対象が有する科学価値を基準とすることである。古代鉄器に理解があつてこそ、現代の鋼鉄文明の過去をさらに一歩進んで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この過去を理解してこそ現代鋼鉄文明の未来をよりよいものとして期待し、なおかつ把握でき、まさにこの一文明を大切に創造する人類とな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えよう。

#### 註

- (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北票市文物管理所「遼寧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原報告は喇嘛洞墓地の年代を3世紀末～4世紀中葉と推定しているが、現在の見解では4世紀初め～後期とすべきで、すなわちその上限は前燕建国前後間もなくで、下限はおそらく後燕に達しているだろうという理解である。
- (2) 孫守道「“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樹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 (3) 喇嘛洞墓地に関するデータは刊行が待たれる考古發掘報告書『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内の統計資料であるが、出土遺物の総数はまだ最終的に確定していない。もし変動があれば、正式発表をもって正とする。老河深と西岔溝の統計データは註2を参照。このうち後者の鉄鏃の数は不明であるため、カウントしていない。
- (4) ある認識では、三燕文化の上限は352年に慕容皝が冉魏を滅ぼして燕国を創建した時で、慕容皝が燕王に自立した337年に始まるとすべきではないとする。このため、もし352年を境とするならば、その前の慕容鮮卑文化は東晋文化の範疇となり、その後、ようやく東文化と並列する三燕文化とみなすことができる。  
（参照）孫進己主編『東北歴史地理』第2巻、102頁、黒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 (5) 同註（1）。  
田立坤「關於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幾個問題」『遼寧考古文集』2、科学出版社、2010年。  
陳平「遼西三燕墓葬論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曾庸「遼寧西岔溝古墓群為烏桓史述論」『考古』1961年第6期。  
劉景文「吉林榆樹老河深墓群族属探討」『北方文化』1986年第1期。
- (6) 陳山『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158頁、科学出版社、2013年および朱泓の序言部分。
- (7) 同註（1）。
- (8) 譚其驥主編『中国歴史地図集』第4冊、9～10頁、中国地圖出版社、1982年。
- (9) 本文中の図二は、以下の文献を参照して作成した。  
韓汝玢主編『中国古代科技史』鉅山礦冶卷、506頁、図8-3-1、2007年。



- (10) 高蒙河『銅器與中国文化』109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3年。  
楊寬『戰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建立「從鉄器的金属学研究看中国古代東北地区鉄器和冶鉄業的發展」『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 (11) 『後漢書』卷90 烏桓鮮卑列伝。  
烏桓はまた烏丸と書かれ、『三国志』卷30 烏丸鮮卑列伝の裴松之注のなかにも同様の記載がある。
- (12) 北京科学技術大学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鉄器的金相実験研究」『文物』2001年第12期。  
陳建立ほか『漢晋中原及北方地区銅鉄技術研究』75頁、表5.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3) 李京華「中国秦漢冶鉄技術與周圉地区的關係」『中原古代冶金技術研究』20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 (14) 同註 (12)。